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遮蔽与发现

吴俊著

h e b i y u f a x i a n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遮蔽与发现

吴俊著

e b i y u f a x i a 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遮蔽与发现/吴俊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321-3174-7

I.遮… II.吴… III.文艺理论-研究-中国 IV.I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043 号

责任编辑:秦玉兰

封面设计:周艳梅

遮蔽与发现

吴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5 1/3 插页 字数 248,000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174-7/I·2413 定价: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19

代序：发现被遮蔽的东西

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一种重要的挑战和考验，可以归之为如何发现（批评对象中）被遮蔽的东西。这也是批评显得有价值而最为困难的地方。

表面上看来，由于媒体的触角无处不在，一切都好像变得“裸露”出来，甚至连各种各样所谓的隐私也几无隐藏的可能。另一方面，炒作又日渐成为批评或与之相关的手段中的不二法门，以至习惯成自然，俨然是批评理所当然的首选和正途。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所处的最显著的特征性的现实氛围。

但是，批评应当具备足够的小心和明智，要避免让的陷阱正在这里。事实往往如此，裸露的表象极有可能在使一切都仿佛变得一览无余的同时，实际上倒是将原本复杂的对象平面化了，一切都显得这样容易理解，批评的深度成为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虚假目标。裸露使批评的神经趋向麻木，心安理得的懒惰取代了悸动的艺术敏感，文学批评因此久久地滞留在现象的表层，在媒体和大众的合唱中分享喜悦，获得满足。很少有人会警惕这将诱使批评变得浅薄和庸俗。堕落的征兆总是在自鸣得意的成就感中不知不觉地出现的。

与此相似，极受青睐的炒作则以其喧哗的造势不断地产生出喧宾夺主的作用和效果，所有的手段都在为一种特定的功利目的摇旗呐喊。炒作并不承诺和保证对于批评的责任，但它能够极度充分地利用批评的形式。在实用主义动机的支配和驱使下，炒作将毫无顾忌、淋漓尽致地极尽其所能。在这种情势中，文学批评很难做到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地保持自

身的清醒和独立会变得十分困难,而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却是最常见的现象。炒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够造成一种既定而强大的事实,这种事实将剥夺你的怀疑能力,逼你缴械,甚至将你一同席卷进去。你在为虎作伥却又根本不能自觉。于是,文学批评沦为一种话语工具,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消失了,单一的目标主宰了它的价值取向。

显然,裸露和炒作的诱惑都能构成对于文学批评的致命损害。它们看似不同的表现形态,造成的则是一致的后果,即阻碍着文学批评深层次、多向度地纵横发展,限制或磨钝了文学批评的敏锐触角,使文学批评丧失其“发现”的功能。换言之,对于文学批评的使命而言,裸露和炒作实质上是以公开凸现的表象无形中起着“遮蔽”对象的内在深刻性的作用,这就像表面上的民主能够遮蔽实质的专制一样。当然,尽管裸露和炒作并非遮蔽的绝对或唯一的根源——专制的罪魁祸首也绝不是民主——但是,在裸露和炒作的时代,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却无疑是文学批评所必须面对的一种重要的挑战和考验。真相既已不可能轻易地浮现,那么,去蔽和发现便是最显困难而少见的品质了。由此来说,批评的使命其实并没有改变,只是现在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文学批评的价值将视对于这种困难的克服程度而定了。

目 录

代序 发现被遮蔽的东西

第一辑 历史维度

世纪末的千年之变·····	3
白话·民间性·鲁迅	
——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札记·····	7
希望是不可言说的	
——从竹内好的《鲁迅》谈鲁迅的文学精神(札记)·····	16
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	23
林纾散论·····	35
百年思想的一种证明	
——我对王元化先生的基本理解·····	45
为《近人学术述林》作·····	61
平民、平民文学和平民利益	
——在2005年北京文艺论坛的讲演·····	65
新媒介文学“革命”刍议·····	73

第二辑 批评现场

另一种门:麦城事件的发生场合	
——我对诗人麦城的回忆和想象·····	87
麦城:好谈哲学的诗人·····	106
瓶颈中的王安忆	
——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	110
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	121

王朔和余秋雨:这个时代的两个英雄人物	131
文化行者的精神气象	146
陈村:写作的挣扎	150
精灵再现:马原在上海写作	155
另一种浮躁	
——从《能不忆蜀葵》略谈张炜的小说写作	160
“中国作家”赵本夫	
——赵本夫创作研讨会(2005年10月,南京)上的发言	163
用文学的方式回家	
——胡廷武的《九听》和《回到西双版纳》	168
古典的叛逆	
——与朱文颖对话	171

第三辑 另种风情

文学的“同时代性”	187
网络文学:技术和商业的双驾车	191
二〇〇二:中篇小说的年度风景	
——林建法选编《2002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197
当代小说的写作资源取向(对话录)	203
愤怒的精英	223
泡沫批评	229
平民心态和文学批评	233
末路上的文学批评	237
当行规遭遇挑战时	
——文学批评的一种困境	246
批评的媒体化	254
偏见·通识·媒体批评	258
独发异声的文学批评家	263
后记	269

第 一 辑

历史维度

世纪末的千年之变

虽说时间是无声无形的,但它却能产生众声喧哗的巨大话题。眼下,所谓的千年交替之变,就已经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好像这是一道门槛,一道决定我们命运的生死界线,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以往的一切,包括我们悲欣交集的满足和失落,都在时间之流中远去。这本与千年之变并无关联,时间仍然一如既往。可是,我们的生命感受和生命状态却在其中发生了变化。这本也与时间没有关系,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不过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和方便,没奈何地立起了一道时间的标杆,企图用来测量甚至规范人事。我们在时间中创造了一切,连同我们的文化,但其实,被我们对象化了的时间,才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现象。我们创造了它,又让它像上帝一样凌驾在我们之上,这样我们才似乎获得了存在的依据。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文化,在时间的默许下寻求自信,在时间的检验下谋取发展。于是,充满想象和野心勃勃的人们,在旁观的面无表情的时间的眼皮底下,虽然渴望肆意妄为,无所顾忌,但在充当创造者的同时,又必须时常察看更大的造物主的脸色。我们毕竟是在时间中生存,时间最终决定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方式。因此,对于千年交替之际时间的关注,不外乎可以归结为我们对自身未来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担忧与期待。总是会有什么注定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时间的法则。那么,千年之变对我们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大约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在隋朝开始出现雏形。经唐代的承传发展,终于成为一项国家的固定制度。此后绵延数代,日渐严密稳定,并伴随了封建王朝的最终命运,直到本世纪初(1905年)

才被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但是,新旧交替的绝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倒是其内容。由这内容的千年之变,造成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革命性结果。

科举考试的内容,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主要就是经义、史论、诗赋和时务等。其中,儒家经典不仅是考试的知识基础,而且也是考试的思想依据和价值标准。如果说儒学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统、主流和主体的话,那么,可以说科举考试制度将它以国家制度的形式从政治、社会和文化及几乎所有方面都确立了起来,固定化了。这种最大范围的制度化形式,较之于汉代董仲舒首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其影响和作用都要远为深广。因为从此以后,以儒学为中心的科举考试成为人人进入官僚阶层、获取政治权力,进入上层和上流社会、巩固或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进入主流文化阶层、享有文化特权等等一切权力和利益所得的不二法门。在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条唯一的途径,别无他途。虽然在科举考试中有时也有算术之类,却一向不为所重,若有似无。同时,还是武举,但也始终为人轻视。因此,从科举制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其实主要是儒学人文知识及其经典思想的考试,它是将中国的儒学传统制度化、社会化和形式化了。由此,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文传统——儒学人文传统。科举制使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获得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保证。

那么,科举制的消亡,显然就不仅代表了一种国家制度的崩溃,而且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革命。发生这一切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在此意义上,20世纪是中国千年传统的终结。五四新文化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前者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的领域内,后者则基本上属于知识文化的范畴。但它们同样都表现了思想上的革命性。如果稍作区别的话,那就不妨说,民主推翻的是儒学思想所支撑的专制政治体制基础,科学针对的是中国的人文主流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不仅儒学不再成为一尊,而且人文传统也不再独占主流,现代的科学因素和科学思想将进入中国的现代文化,并构成中国的现代科学文化。整个20世纪就是中国的现代科学文化努力形成其自身传统的历史。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视为20世纪中国文化中双线递进的主流文化趋势。这种文化结构中的革命,谁能说不是中国

文化传统的千年巨变。

但是,这种以现代科学文化为标志的 20 世纪中国文化对于千年传统的终结及其所代表的千年巨变的过程,却又充满了矛盾、曲折和痛苦。从世界范围来看,20 世纪内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又是漫长的冷战时期,柏林墙直到 90 年代才刚刚被推倒,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各种冲突更是起伏不断。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种紧张、对立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中,并且,还是处在明显的弱势和落后的地位。而在中国内部,前半世纪基本上是内外战争和民族危机的时期,后半世纪的前三十年,则大致可以说是闭关自守、与世界和现代文明隔绝的三十年,而且,其间还发生了“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只是从最后二十年开始,中国的现代文化才终于又走上了复兴之路。这时已经到了世纪千年之末了。我们在世纪之末才重新接上世纪之初的步伐,重新启动意味着千年之变的文化结构转型的历史变革。但较之于世纪初,我们在世纪末又增添了新的困难。一方面是在这百年之中,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原先能够料想的程度和水平,另一方面是百年来的人文启蒙文化或者说人文精英文化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而科学文化则未能真正或普遍地成为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和社会意识。因此,前文所谓中国现代文化在世纪末的复兴,主要和关键的所在,是世纪初新文化的科学(文化)的复兴,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在世纪末的复兴。甚至(或许有些极端),必须再次终结人文传统——它在 20 世纪的表现,就是人文启蒙文化或人文精英文化——独占中国现代文化主流地位的现象和历史。简言之,科学文化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这称得上是世纪末将要进行或已经发生了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千年之变。

世界先进科技已经开始全面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以电脑网络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使知识、思想、文化和所有信息的全面沟通与共享成为可能,与传统社会相比,封闭和专制的意识形态铁幕,将被网络世界所冲破。这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怀疑的事实了。同时,高科技还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这都将对世纪末千年之变中的中国

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就是最大范围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可能性及其生存空间。不仅网络和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必然造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而且,人们(社会)的文化需要本身,也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这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与原先的中国文学形态相比,一般所说的精英文学其实并未受到全面排斥,只是它的独尊和经典的价值地位发生了挪移,这是因为社会对于文学的价值期待有了新的自觉,对于经典文学的要求已经有所不同。这种对于文学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很有点类似世纪初新文学时代的情形。虽然白话文学俨然新的文学正宗,但传统的经典文学并未全然遭到舍弃,只是被迫让出了一点原先独占的主流及其价值地位而已。因此,今天也没有必要将大众化、通俗性乃至消费型、商品化的文学视如洪水猛兽或腐败堕落。倒是应当把已经进入文学体制的市场经济和文学生产因素所产生的后果,置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值得反思的不仅是市场(经济)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而且也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说得绝对一点,即便中国文学受到了一些挑战和冲击,但中国的科学文化和经济发展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偿付的代价却要更大。否则,也就不会有如今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千年之巨变了。或许,就在这千年巨变中酝酿了新的中国文学革命——文学是我们的希望,但不是我们的全部。

2000年1月12日

白话·民间性·鲁迅

——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札记

一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宠儿,代表了五四新文化的核心价值依据,并构成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的主要思想内涵。但就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而言,活跃于政治和文化思想层面上的德、赛二先生,只能说是提供了一种知识背景和时代精神,还不足以成为历史(文学史)层面上的标志。五四新文学有其自身的历史资源和凭借,那便是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可以说,因为有了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才使得以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新文学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至于胡适等人所援引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学史例证,不过是他们为白话新文学寻找的理由而已。真正能够支持他的,应该是《白话文学史》(上册)中所说的一切。所以,五四新文学仍不能不以现代白话文学的主流地位的确立为诞生标志,这样才能在历史的叙述中合理地交代得过去。

换言之,中国文学是以白话文学是否作为文学正宗和主流而划分为新(现代)、旧(传统)的。在白话文学的谱系中,新文学是将原先处于从属的、民间的白话文学确立为主流的、正统的文学地位。如果说白话文学的主流和正宗、正统地位始于新文学,那么新文学为之所做出的成功努力的结果,也便是宣告了自己的诞生。

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学问题。或者说,从中可以见出的是五四

新文学的一种较为隐蔽的价值立场及其文学姿态。

一

“白话文学正宗说”是新文学的一个口号,也是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理论中日渐明确起来的一个核心观念。不过,为白话(文学)张目也并非自胡适和新文学始。这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特别是维新人士中的一种言论倾向甚至是“强势话语”。为作比较,姑引梁启超语为例。他为证明自己的“清文无特色”的观点——这应当说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观点——曾作为这样的分析:

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中国)字体变迁不剧……既不变其文与语,故学问之实质虽变化,而传述此学问之文体语体无变化,此清代文无特色之主要原因也。^①

看起来他是将文字、文体视为文章、文学的关键因素的。在另一处,梁氏就说得更明确了: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欲语文学大发达故。^②

这种言论对于白话新文学及其文学史正宗地位的理论,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胡适对此却又说得极其尖锐。他认为“文学革命”运动前的看重白话,“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梁启超:《小说丛话》。现据《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的主张白话文学’”。为什么呢？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只有“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①。因为在梁启超（包括当时的维新人士）的文学观念中，至少有两点是胡适和新文学所不能接受的——或者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那就是依然将文学当作教化（载道）的工具，同时，将读者（民众）纯粹视为施教的对象，而非真正的文学参与者。这其实还是一种文学的等级观念（文言文学、白话文学）和社会的等级观念（士大夫、知识者和民众百姓）的作祟。例如，梁启超就明白主张要用“小说”来向社会民众灌输正统思想和政治主张，理由是“物各有群，人各有等”^②。他之推崇“政治小说”，动机也便在此。

与此可以形成鲜明对照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在胡适的文章里则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述的：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③

其中明确地表现出一种前瞻性的文学史立场和眼光。显然，这已经同梁启超的“新小说”和“俗语文学”理论拉开了思想距离，树立起一种崭新的文学价值观。而这种文学史立场和文学价值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即便是属于新文化阵营中的领袖或头面人物，也还不是或难以充分具备的。比如，蔡元培就认为，“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现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亚东图书馆，1924年。

②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另参见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等。

③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概指诗歌、小说、剧本等——引者),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①。他对“应用文”和“美术文”的区分,实际上是以对白话和文言的文学价值判断为依据的,即更倾向于认同文言文学的地位,这与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同时,更为深刻的是,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含有建立同一的民族文学的具体目标和实质性内容。这就是他为白话新文学设定的更高的进化目标——国语文学。从其语言形态上而言,“国语”文学将一劳永逸地彻底消除有关文学的阶级(等级)差别,使中国新文学真正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全民文学。较之于传统的文言文学,白话文学将是人人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而不再被少数人或特权阶层所独占和垄断。胡适将此称作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②这段话中有关“国语”和“文学”的关系的阐释大可玩味,而其思想和理论的渊源,则无疑始自胡适最早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因为他紧接着的论述就说得极其明确:“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③从白话(文学)到国语(文学)的历史和逻辑的转换,就是这样完成的。

那么,白话文学正宗说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就显现出来了:通过确立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即白话文学的主流传统),文学的价值立场便发生了一种转换,即由士大夫的正统价值立场转换为民众(民间)的非正统的或世俗性的生活形态的价值立场。这不仅是重写文学史,而且还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民间价值立场的建立。我把这也视为是五四新文学的

①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② 胡适:《答钱玄同》,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③ 同上。